



新九期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

燕京學報

燕京研究院

北京大學出版社

燕京研究院

# 燕京學報

新九期

主 編： 侯仁之 周一良

副主編： 徐蘋芳 丁磐石

編 委：（按姓氏筆畫排列）

* 丁磐石	王伊同	王鍾翰	伍福強
* 吳小如	汪馥鬱	* 林孟熹	林 庚
林耀華	林 熹	周一良	侯仁之
* 徐蘋芳	* 夏自強	張芝聯	張瑋瑛
張廣達	* 經君健	* 程毅中	趙 靖
* 劉文蘭	* 盧念高	謝國振	* 蘇志中

（\* 常務編委）

編輯部主任： 劉文蘭

編 輯： 江 麗 李月修

北京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北京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燕京學報 . 第 9 期 / 侯仁之, 周一良主編 . —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0. 11  
ISBN 7-301-04822-X

I . 燕… II . ①侯…②周… III . 社會科學-期刊 IV . C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0)第 78815 號

**書 名:** 燕京學報 新九期

**著作責任者:** 燕京研究院

**責任編輯:** 王春茂

**標準書號:** ISBN 7-301-04822-X/C·207

**出版者:**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澱區中關村北京大學校內 100871

**電話:** 出版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4140 編輯部 62752032

**排版者:** 北京軍峰公司

**印刷者:** 北京大學印刷廠

**發行者:** 北京大學出版社

**經銷者:** 新華書店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開本 21 印張 332 千字

2000 年 11 月第一版 2000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數:** 0,001 - 1,500 冊

**定 價:** 39.50 圓

# 目 錄

司馬談、遷與老子年代 .....	何炳棣( 1 )
三王與文辭	
——《史記·三王世家》析論 .....	呂世浩( 21 )
居延出土漢律散簡釋義 .....	陳公柔( 65 )
試論我國古代吏胥制度的發展階段及其形成的原因 .....	祝總斌( 87 )
明清之際望遠鏡在中國的傳播及製造 .....	戴念祖(123)
清冊琉球使齊鯤與費錫章有關琉球著作考 .....	徐玉虎(151)
王國維與哲學 .....	葉秀山(175)
陸雲《與兄平原書》臆次編說 .....	朱曉海(193)
納西族哥巴文字源流考 .....	黃振華(237)
關於中國古代人種和族屬的考古學研究 .....	潘其風(277)
燕園女文學大師冰心 .....	卓 如(295)
許政揚與《許政揚文存》 .....	周紹昌(307)
讀《全唐五代小說》札記 .....	程毅中(321)

# Contents

Sima Tan, Sima Qian and the Dating of Laozi .....	He Bingdi( 1 )
<i>Biographies of the Three Princes of the Historical Records</i> and its Diction .....	Lü Shihao( 21 )
An Interpretation of Han Dynasty Laws Seen on Scattered Slips Unearthed from Juyan .....	Chen Gongrou( 65 )
A Study of the Chinese Ancient Inferior Officials: the Development Phases and their Causes .....	Zhu Zongbin( 87 )
The Spread and Manufacture of Telescope in China Betwee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	Dai Nianzu(123)
Study of Publication Regarding Ryukyus Written by Ching Dynasty's Special Envoy to Ryukyus Kun Chi and Hsi-Chang Fue .....	Yu-hu Hsu(151)
Wang Guo Wei and Philosophy .....	Ye Xiushan(175)
On Lu Yun's "Letters to Brother Lu Chi" .....	Sherman Chu(193)
On the Origin of the Geba Script of Naxi(Nakhi)Nationality .....	Huang Zhenhua(237)
The Ancient Chinese: Their Racial Types and Some Problems of	

Contents

---

Their Ethnic Origins ..... Pan Qifeng(277)

Woman Literary Giant of the Last Century—Bing xin ..... Zhou Ru(295)

Xu Zhengyan and *The Extant Works of Xu Zhengyang*  
..... Zhou Shaochang(307)

Reading Notes on *The Fiction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Five Dynasties*  
..... Cheng Yizhong(321)

# 司馬談、遷與老子年代\*

何炳棣

1936年終，羅根澤先生在他主編的《古史辨》第六冊的序言裡曾作了過渡性的綜結：

關於考據老子年代的文章，止第四冊及此冊所收，就已有三十五、六萬言，真是小題大作。不要說旁觀者望而却走，當事者也見而生畏。但老子的年代問題究竟是需要解決的。除非將先秦的學術束之高閣，否則這個問題如不解決，一切都發生障礙。

羅氏序文之末列舉了自兩宋陳師道、葉適，經有清畢沅、汪中、崔述，迄民國梁啟超、胡適、馮友蘭、顧頡剛、錢穆、郭沫若、唐蘭、張岱年、高亨及羅氏本人等二十九家對老子年代的個別看法<sup>①</sup>。

《古史辨》第六冊問世至今六十年間，老子年代的討論時斷時續。1973年終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甲、乙本的發現造成《老子》版本校讎方面的突破，但就老子其人其書的年代而言，仍無法消除兩派截然不同的意見。要之，一派始終認為老子早於孔子，他的學說經弟子世代相傳纔編就於戰國時代；一派堅決認為老子其人其書都是晚於孔子。

由於《古史辨》第四及第六冊早已收集了有關老子年代研究較重要的論文，而近年古棣、周英合著達百萬言的《老子通》更對疑《老子》派多篇文章裡根據所謂的“思想線索”、“文字文體”、“時代術語”等片面思維與論辯——

---

\* 作者曾在2000年1月香港中文大學逸夫書院1999~2000年度傑出學人講座上講過與此文有關的內容，並以《The Dating of Lao Tzu: Reconfiguring the Intellectual Apprenticeship of Grand Historians Ssu-ma T'an and Ssu-ma Chi'en》為題，印發簡短的英文提要，可以參閱。現特發表全文，以饗學林。

加以批駁<sup>②</sup>，所以本文理應極力避免重複前人已有的議論，祇集中提出個人的分析和推斷。

## 一 司馬談和老子後裔世譜

主張老子其人晚於孔子，《老子》其書編就於戰國中、晚期的不少學人，幾乎無一不從《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惟一具體的記載出發：

老子者，楚苦懸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宗之子注，注子官，官玄孫假，假仕於漢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

《史記》此段陳述清晰平實，與同傳有關老子幾種傳說之撲朔迷離適成一鮮明的對照。正因為老子後裔世系如此具體確鑿，我們有必要先探測它最可能的來源，然後纔能評估它的是否可信。

讀習中國古代思想史的學人幾乎無不同意全部《史記》中最系統、最深刻、最精彩、最權威的論文之一就是《太史公自序》裡司馬談的《論六家之要指》。司馬談不但首次鑄出“道家”這一學術流派的專詞，他本人就是造詣極深的“道德”學家。現存《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老子後裔世譜源自司馬談是最合理的推斷，問題在臆探他是怎樣得到這個李氏譜系的。

《太史公自序》中說明“太史公（司馬談）……仕於建元、元封之間（公元前140～前110）”，卒於前110年而未言及出生之年。《自序》中言及司馬談七代的祖先及其官職。試從備有較具體年代的曾祖司馬昌下推。“昌為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這官職既是他一生最後最高的職位，猜想中他在始皇初年應已年逾五十。姑以整數估算，他在始皇二年（前220）時年五十。有鑒於古代嬰兒死亡率高，司馬談每一世代的祖先未必各各都是頭胎出生的男孩，因此我們假定每兩個世代年齡平均相差三十年。照此估算，司馬談的祖父無澤大約出生於公元前240年，壯年以後改朝換代“為漢市長”。司馬談的父親，仕至五大夫的司馬喜，大約生於前210年，而司馬談本人大約生於前180年<sup>③</sup>，明年即漢文帝元年，所以他的青少年（約前165～前155年）正值黃、老“道德”



之學的政治影響鼎盛的文、景之世。

本世紀研究司馬遷《史記》的中外學人雖一般都注意到他的先世，但都未能充分了解他高祖昌、曾祖無澤官位職守的特種意義。案：“昌爲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這一極其簡括的陳述已經暗示司馬遷的高祖決不是一員普通的官吏。“主”持當時最強大的秦國的全部鐵政——從採礦、冶鑄到種種鐵器（包括兵器）的製造與供應——必需有相當的技術知識和很高的生產策劃管理的才幹。鐵政的成功顯然是秦滅六國完成統一大業過程中一個重要技術性的環節，其中司馬昌的貢獻是不言而喻的<sup>④</sup>。

司馬昌之子無澤“爲漢市長”一語的意義更需深索。案：漢高祖五年（前202）項羽敗死垓下，劉邦應諸侯將相之請即皇帝位，定都洛陽。夏六月從婁（劉）敬、張良議，決定遷都關中。關中表裡河山，形勢優越，但苦在咸陽遭受項羽焚燒已殘破不堪。於是次年有詔“立大市，更命咸陽曰長安”<sup>⑤</sup>。可見立大市是爲大規模營建渭水南岸新都長安的第一步準備——如何籌劃管理各項所需物資的動員與供應。《漢書·高帝紀下》“六年（前201）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更能反映立大市於長安的真正目的。必須指出的是高祖六年所立的大市決不是武帝太初元年（前104）以後京兆尹轄下的“左都水、鐵官、雲壘、長安四市”中的一市<sup>⑥</sup>。《漢書·惠帝紀》六年（前189）夏六月“起長安西市，修敖倉”，即係明證。這是第一次因建設所需從原來的大市中分出去的“西市”。原來的“大市”之所以稱“大”，正是說明最初祇有一個事權統一的“大市”。《漢書·高帝紀》七年（前200）“二月，〔帝〕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大倉”。高祖以爲過於“壯麗”。《漢書·惠帝紀》：“三年（前192）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五年（前190）“春正月，復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可見營造新都長安的工作效率是相當高的，而背後負責大量物資供應的是“未被謳歌的英雄”司馬無澤。

司馬氏先世中，我們對司馬談的父親司馬喜所知最少。《太史公自序》僅言“喜爲五大夫”。當代有些中外學人以五大夫爲有爵無官的空銜<sup>⑦</sup>。這是與史實不符的。《漢書·百家公卿表上》的序文論爵制，五大夫是自下而上二十級中的第九級。顏師古注，第八級的“公乘”已“得乘公家之車”，五大夫則

“大夫之尊也”<sup>⑧</sup>。漢承秦制，秦滅六國前，曾不時以五大夫將兵出征<sup>⑨</sup>。司馬喜之五大夫與武帝元朔六年（前 123）賣“武功爵”中的五大夫是迥然不同的<sup>⑩</sup>。至於司馬喜是否最初納貨爲郎、由郎陞至五大夫，限於史料，無由得知。很可能他中年早世，以致事跡無考。

事實上，司馬談最出名的先人是七世祖錯和五世祖靳。司馬錯不但是名將，而且是敢於和張儀論辯政策，極有遠見的政治家。爲增強秦國的資源基礎，他於公元前 316 年滅了具有“天府”潛力的蜀國——這是秦之終能征服六國的重要經濟因素之一<sup>⑪</sup>。司馬靳是殲滅趙國四十萬大軍的長平之役（前 262 ~ 前 260）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在此役之後三年與主帥白起一同“賜死”這一悲劇，似乎反映他當時輝煌功績和副帥身份<sup>⑫</sup>。

鉤稽相關史事之後，我們有理由相信入秦的這支司馬氏，無論仕文業武，自始即代表一種幹練務實，忠於職守的優良家風。司馬談、遷兩代太史治學之闕深淹貫，卓絕古今，決非偶然。

《史記·太史公自序》明言司馬談“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他青年時期的教育值得窮索，因對評價《史記》所保留的老子後裔世系有密切關係。《史記·儒林列傳》：

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前 134）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為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可見秦漢之際《易》的權威是田何，西漢文景之世《易》的權威是司馬談的老師楊何。《史記》雖稱田何是齊人，其實“齊”是泛指六國時代齊國舊都臨淄附近地區，田何與楊何事實上都是菑川人。由於入漢以後田何徙居杜陵，因號杜田生，“漢惠帝曾親幸其廬受業”<sup>⑬</sup>。漢代最重師承，如漢初魯《詩》權威申公，老年“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sup>⑭</sup>。青年時代的司馬談非親到菑川留學拜師，無法成爲楊何的入室弟子。《漢書·藝文志》：“三年而通一藝”，司馬談留學齊都，即使僅習《易》及道論也需要三幾年

時間，何況他自始即志在成爲通才。

《史記》對司馬談習“道論”的黃子記載不詳。我們祇能肯定黃子就是景帝（前156～前141）時曾與《詩》權威齊人轅固生在朝中辯論湯、武革命的性質的黃生。黃生的鄉里雖無法確定，但當時黃、老道學的重心在齊是肯定無疑的。《史記·樂毅列傳》保留了彌足珍貴的黃老學統。由於燕王的疑忌，樂毅本人及其子孫近親都先後逃亡到趙國，皆“卒於趙”。秦滅趙後二十餘年，漢高祖過趙訪樂毅之後，封其孫樂卿爲華成君。《史記·樂毅列傳》有特別的說明：

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趙且為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

《史記·曹相國世家》可供進一步參考：

孝惠帝元年（前194）除諸侯相國法，更以〔曹〕參為齊丞相。……〔曹參〕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

如此曲折、具體，詳盡到每一世代大師的姓名、鄉里的黃老學統決不會在漢初即入藏石室金匱，祇有青年司馬談纔能親自獲得於膠西蓋公嫡傳再傳弟子的。這項史料來源之可靠性與權威性是古今中外罕有其匹的，因為它源自漢高祖過趙偶然的訪詢，終於黃老信徒曹參的政治踐履。就本文本節而言，黃老道統最關鍵性的記述是秦漢之際重心自膠東高密西移至膠西。更重要的是膠西正好聯繫上《史記·老子列傳》中孤零零，但又極具體的老子後裔世系，特別是老子八世孫李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這句結語。

《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列出文帝十五年（前165）從齊國分封出去的六個新國，其中兩個毗鄰的新國是菑川和膠西。菑川國都在國境極東部的劇縣，而經濟和文化發達的地區却西臨淄水，與戰國時期齊國故都臨淄隔水相

望。《周易辭典》以秦漢之際的菑川即今山東益都一帶應該是接近事實的<sup>⑮</sup>。膠西國都是苑，非細讀《水經注》淄水條不易鑑定是當時所謂的“西高苑”<sup>⑯</sup>。若以齊國古都臨淄為圓心，東南的劇縣和西北的高苑都在五、六十公里半徑之內。這個面積有限而很繁盛的區域在文、景之世不但是《易》和道論的中心，並可認為是新的稷下，全帝國第一學術重鎮。授司馬談道論的黃子極可能就是此一地區的碩學之士。司馬談《易》學的老師楊何，在前134年被召至長安以前，一直在菑川講學收徒。青年司馬談之所以能打下深厚的學術基礎正是由於他能如西諺所云“躬飲於泉之源”。想像中，司馬談留學菑川期間，以周秦漢世宦之裔的身份，應有晉謁膠西王卬太傅李解當面聆教的機會，甚至有直接從李解獲得李氏譜系的可能。即使李氏譜系不是直接獲自李解，至少也應是得自當地蓋公嫡傳或再傳弟子的。《史記》的老子後裔世譜理應是極珍貴第一手原始資料。

如果筆者的推論——老子後裔世譜是司馬談青年留學臨菑、膠西親自獲得的——並無大誤，何以半個多世紀以後司馬遷寫纂《老子列傳》的時候不但不能說明此項資料的來源，而且並列種種自我懷疑更令人迷惑的傳說和奇想？這確是中國學術史上兩千年來最難答覆的問題。但我們仍然必須從兩方面去理解：何以對老子後裔世系的資料來源司馬談必須長期保持緘默？何以即使父子之親也無法保證學術傳承定無自然和人為的梗塞？

## 二 司馬遷的生年和青年時期教育

司馬遷的生年是我國學術史上的一個重要年分，對本文本節的討論更具有關鍵性的意義。但我們首先必須解釋司馬談對老子後裔世系長期緘默之故。案：景帝三年（前154）吳楚七國叛亂是西漢劃時代的大事。叛亂的主謀是吳王濞，但膠西王卬實居第二領袖的地位，正月間已“誅漢吏二千石以下”。二月中，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曰：“……今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腰）斬”<sup>⑰</sup>。這是最嚴酷、牽涉最廣的一次誅殺。負有輔導膠

西王印責任的太傅李解之遭族誅應是不辯的事實。凡與李解生前有過交往的人，爲自全計，惟有諱莫如深。當司馬談任太史令期間，先有主父偃那樣專事刺探諸侯王以至儒臣如董仲舒等私隱冀興大獄的陰謀家，繼有趙禹、張湯那樣酷急刻深、尋端窮治的執法大臣，和一系列鷹鷂嗜殺如甯成義縱，王溫舒等酷吏型的太守<sup>⑧</sup>。在張湯任廷尉和御史大夫備受武帝寵信的十一年間（前 126 ~ 前 115），淮南、衡山、江都三王略有反迹即誅連數萬人之多；丞相李蔡有罪自殺，丞相莊青翟下獄死；自前 119 年初算緡錢，由於政府鼓勵告密，未數年“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產〕”，甚至以廉直聞於當世的大司農顏異，亦難免爲張湯以“腹誹”之罪論死。是以張湯本人於前 115 年初有罪自殺，“而民不思”。在帝王專制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司馬談不得不謹言慎行，對青年時代與李解的交往長期保持緘默。

至於司馬談、遷父子之間史料傳承之所以不盡理想，我們必須先了解父子年齡差距之大。司馬遷生年至今仍無定論，兩種不同的說法皆源自《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唐司馬貞《索隱》和唐張守節《正義》的兩則注解。《太史公自序》：

〔司馬談〕卒三歲（前 108）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

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曆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

在“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句下，《索隱》引晉《博物志》：“太史令茂陵顯武里大夫司馬遷，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這是標準的極可信的漢代公文格式。準此則司馬遷應生於武帝建元六年（前 135），司馬談卒於前 110 年時，司馬遷二十六歲。本文估推司馬談生於前 180 年，司馬遷出生時司馬談已年四十有六。“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句下，先有劉宋裴駟《集解》引李奇曰：“遷為太史後五年，適當於武帝太初元年，此時〔始〕述《史記》。”後又有張守節《正義》的注：“遷年四十二歲。”<sup>⑨</sup>如照張說推算，司馬遷應生於景帝後五年（前 145），兩說相差十年。在缺乏任何證據支持的條件下，王國維在他《太史公行年考》的長文裡<sup>⑩</sup>，自始即認為張守節正確，司馬貞引《博物志》中“年二十八”之“二”必係“三”傳鈔之誤。事實上對王說最簡單、

最直接、最有力的反駁就是司馬遷晚歲《報任安書》中的陳述：“僕今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sup>②</sup>《禮記·曲禮上》：“三十曰壯，……四十曰強。”如果父喪於本人三十六歲由壯而強之齡，絕對無法解為“早失”。司馬遷是獨子這一事實，大有裨於了解司馬談對他青年時代教育籌劃之備極用心。

本世紀舉世漢學界皆對靜安先生考證的精覈極為敬仰，一般都接受其說，甚至集體點校，由中華書局出版的《史記》序文，都採取司馬遷生於公元前145年之說。海外漢學界亦無不如此。王文所涉甚廣，本文本節祇宜以公元前135年為坐標，在字字忠實於《太史公自序》的考證過程中，順便指出靜安先生歪曲奪理之處。《太史公自序》：

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鄆、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

王國維繫年雖有問題，他認為司馬遷十歲時已“隨父在京師，故得誦古文矣”。並謂“自是以前必已就閭里書師受小學書，故十歲而能誦古文”。闡釋甚為精當。《自序》中自十歲至二十歲而南遊江淮這一段完全是空白，但這十年無疑義是司馬遷一生學術奠基最關鍵的十年。想像中司馬談除了親自講授，為早慧的獨子精心擬出一個博大閎深的長期課業計劃之外，並介紹司馬遷向京師權威的學者不時請教。京師權威學人之名之見於《太史公自序》及《史記》、《漢書》之《儒林》等傳者有天文曆算家唐都、董仲舒和孔安國。

唐都長期在長安，司馬談留學齊都返關中後曾“學天官於唐都”。司馬遷除從父親可學天官之外，很有向唐都隨時請教的機會。王國維深信史遷生於前145年主因之一是若不如此，司馬遷年紀過小恐怕趕不及向董、孔等大師求教，特別是有鑑於《史記·孔子世家》的記事：“安國為今皇帝〔武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印、印生驩。”漢代儒林中人生平大事很少有具體的年分可憑；

為滿足自己的好奇心，筆者累月翻檢核對，終於得出董仲舒、孔安國生平大事的年分。現仍健在的衍聖公孔德成私藏的《孔子世家譜》：“安國，字子國。明達淵博，動遵禮法。少學詩於申培公，受《尚書》於伏生，以文學政事名。年四十為諫大夫。”<sup>②</sup>案：《漢書·百官公卿表上》“武帝元狩五年（前 118）初置諫大夫，秩比八百石”。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認為“蓋初置此官，而安國即為之”應是合理的推斷<sup>③</sup>。準此，則孔安國應生於文帝最後一年（前 157），少司馬談 23 歲，長司馬遷 22 歲。再《孔子世家譜》記有武帝元朔二年（前 127）孔臧奏辭御史大夫之語：“臣世以經學為業，……從弟侍中安國受詔綴集古義，臣乞為太常，典臣家業，與安國紀綱古訓，使永垂後嗣。從之。”<sup>④</sup>準此，則孔安國至晚在元朔二年已由博士加官侍中，於前 118 年充任諫大夫。《漢書·地理志下》，臨淮郡武帝元狩六年（前 117）置，孔安國此年始離長安就任臨淮太守。所以司馬遷“年十歲則誦古文”到年二十而南遊的十年間（前 126 ~ 前 116）能有充分機會師從孔安國，獲得專業水平解讀古文《尚書》的能力。

為了一勞永逸，我們還有必要圓滿答覆王國維提出的有關孔安國的兩個問題。一是安國“早卒”。案：孔子之子鯉，先孔子死，兩千餘年來學人都認為孔鯉早卒，但他死時年已五十。孔安國如享年未及半百，當然可認為是“早卒”。再則安國學術、事功漸臻頂峰之際<sup>⑤</sup>，遽而中逝，從惋惜的觀點更可稱為“早卒”。王國維關於孔安國最後一個疑問——何以安國之子、孫之名如此之速已見於《史記·孔子世家》？《孔子世家譜》對此亦有圓滿解答。孔子九世孫孔鮒之弟“騰，字子襄，身長九尺六寸，通經博學。漢高祖十二年（前 195）如魯祀先聖，封為奉嗣君，奉先聖祀。惠帝徵為博士，遷長沙太守，年五十七卒”<sup>⑥</sup>。孔騰之字子襄見於《史記·孔子世家》，是安國的曾祖。“奉嗣君”是後代衍聖公制度的濫觴，此後“奉嗣君”直系男嬰出生必須呈報朝廷備案。孔安國如充臨淮太守一兩年即卒於官，時年四十二、三，抱孫本非全不可能；即使嫡孫身後出生，史遷出於師生之誼亦可據檔冊錄入《孔子世家》，原不足怪。

一代儒宗董仲舒生平大事繫年，兩千年來，眾說紛紜，迄今仍無定論。待刊拙作《董仲舒宦業繫年考辨》中有詳細論證。簡而言之，《漢書》董傳及《資治通鑑》皆誤繫董氏所對天人三策於武帝建元元年（前 140），而事實上對

策應在元光元年（前 134），“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sup>70</sup>。江都王劉非，謚易，卒於前 128，董仲舒即內調爲中大夫，“掌論議”，備顧問。甫至長安即險遭主父偃陷害；因言災異，“當死”，蒙“詔釋”，雖“中廢”，仍留充中大夫<sup>71</sup>。公孫弘爲丞相（前 124）後始計出仲舒爲膠西國相。由於學術及操守方面互相器重，董仲舒與司馬談同仕長安期間不時過從，早慧的司馬遷得緣親聆兩位鴻儒暢論經史，闡析《春秋》，應係情理中事。《太史公自序》答上大夫壺遂：“余聞董生曰……”應有事實根據。全部《史記》凡言及《春秋》，無不取義於《公羊》，僅採史於《左氏》，更反映司馬遷自幼至老治《春秋》受董仲舒影響之深<sup>72</sup>。

司馬談爲愛子教育用心之苦是古今罕匹的。除以十年心血講授督導之外，他不惜動用爲數可觀的家資實現司馬遷尋訪天下名勝古蹟的遠遊計劃；因此爲實踐廣義的人文教育做了示範工作——讀萬卷書之外，還須行萬里路。這種博聞益智的遠遊既可作爲長期整合古今工作的初步體驗，又可作爲觀察國情民隱、培養閱世知人能力的直捷良方。真不愧是理想的入仕準備。細讀《自序》所列行程，特別是包括“講業齊魯之都”，恐怕此次遠遊並非一年之內所能完成。本文主旨在評估《史記》的史料價值，我們祇宜深探“講業齊魯之都”期間的史料收獲。

梁啟超曾指出：“昔司馬遷作《孔子世家》，自言‘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低徊留之不能去焉’。作史者能多求根據於此等目睹之事物，史之最上乘也。”<sup>73</sup>任公先生所論極是，但他尚未進一步推斷司馬遷在魯國故都講業期間最重要的文獻收獲是後來編入《史記·魯周公世家》中的歷代魯君世系和在位年代。此傳之中，除了伯禽初封爲魯侯之年分無考之外，其餘自第二世魯侯考公以降全部在位年代俱備，而且內中有關鍵性的“真公十四年，周厲王無道，出奔彘，共和行政”一語，貫通了西周和魯國的年代。此年（公元前 841）迄今仍是我國最早的絕對年代。按《魯周公世家》積年，考公元年應爲公元前 998 年，按《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應爲公元前 997 年，上距古本《竹書紀年》武王伐紂（公元前 1027 年）僅 29 或 30 年。《竹書紀年》原爲記載夏、商、西周、春秋、戰國時期的魏國史事年代之書，記事止於魏襄王 20 年（公元前 299），埋藏地下五百餘年，至西晉始重現人間，但不幸又佚



失於宋代，殘闕經過輯校的版本已是研究古史年代的至寶。而《魯周公世家》除伯禽一世外，保有完整的兩周歷世魯君的年代。這部免於秦火的魯國“紀年”正是考核以魏爲主的《竹書紀年》的絕好資料。在考訂武王伐紂的絕對年分的工作中，《魯周公世家》史料價值之高是顯而易見的。

此外，司馬遷自闕里還獲得後來編入《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的原始資料。此傳中仲尼弟子之記有具體年齡者共 22 人。內中子路“少孔子九歲”爲最長，公孫龍“少孔子五十三歲”爲最幼。司馬遷還特別說明，“自子石（公孫龍）以右三十五人，頗有年、名及受業聞見於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於左”。這不僅顯示出史遷對資料來源分類的異常謹慎，全部存真，而且反映當時魯故都和闕里確保存有他處所無的舊文獻。

以上對《魯周公世家》和《仲尼弟子列傳》史料來源的檢討，不正好平行反映《史記》之《儒林列傳》、《老子·韓非列傳》等卷中所保留下來的六藝傳承學統，特別是備極曲折的黃老學統和老子後裔世系，都是青年司馬談講業齊都期間所親聞親記的、價值極高的原始史料嗎？

司馬遷的萬里遠遊一方面象徵少青年教育的圓滿結束，一方面是爲入仕的準備。自 21 歲（前 115）南遊歸來，至 26 歲（前 110）春間父親之死於病憤這五整年，是決定司馬遷一生職守和使命的關鍵。此五年間《自序》敘事有條不紊，而王國維在《太史公行年考》文中對這五年的處理却暴露出一系列致命的弱點。“致命”的原因是：他在長文的開頭雖可主觀強以公元前 145 爲史遷生年，但對《自序》中南遊的年歲（20 歲）和司馬談的卒年（前 110）不能拋棄不顧，所以無論如何支吾曲解也無法將《自序》中五年間川流湍急的具體紀事拖緩拉長到十五年<sup>①</sup>。他在“元鼎元年（前 116）乙丑三十歲”條下“案：《自序》云：‘於是遷仕爲郎中。’其年無考，大抵在元朔、元鼎間（前 128 ~ 前 116），其何自爲郎亦不可考”。其實，王國維此處故意佈出疑雲，司馬遷初仕爲郎中的精確年分雖不可知，但肯定在南遊結束（前 115 或前 114）之後，以“隨軍史家”身份參加遠征西南夷（前 111）之前<sup>②</sup>。至於“其何自爲郎中”，《漢書·儒林傳》元光五年（前 130）公孫弘再度被徵時的對策就是明確的答覆：“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